



《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

《外国文学研究》创刊于1978年,今年适逢它诞辰40周年。屈指一数,它已经走过了又是阳光又是风雨的40年。2018年6月8日下午,“中国外国文学期刊发展历程与国际化战略”研讨会在武汉雄楚国家大酒店隆重举行。本次会议既是讨论中国外国文学期刊的发展和国际化问题,又是《外国文学研究》杂志40周年诞辰的一次盛大庆典。有关会议的盛况已有专门报道,这里无需多言,但《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关系,以及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和发展的关系,应该还可以多说几句。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曾艳兵

句。回顾《外国文学研究》发展壮大的历史,所有与该刊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学者和读者都感慨良多。40年弹指一挥间,其中的辉煌与艰辛人们有目共睹。杂志经历了四任主编,各有千秋,各有建树。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废江河万古流”。风雨40年,《外国文学研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5700余篇,它已然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聚集了许许多多的研究者,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队伍,一股重要的学术力量。

围绕着一份学术期刊,总会有一些编者、一批作者和大量的读者,刊物的发展繁荣与此三者密不可分。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这就是学人、学刊和学术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学人,学刊和学术无从谈起;没有学刊,学人的思想和成果没有了发表的阵地,无人知晓,最终会湮没无闻;没有学术,学人和学刊都失去了根基,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学人的成长离不开学刊,学刊的成就离不开学人,学人与学刊构成了

学术的基础。任何学者,都有过读文章、写文章、发文章的经历,这些经历当然都与期刊有关。期刊对于一个学者的培养与塑造,其意义至关重要,对于那些正在成长的青年学者更是如此了。有时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选择或人生轨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期刊具有培养青年学者的任务或职责。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而言,我既是读者又是作者;既是作为读者的作者,又是作为作者的读者。随着身份的相互转换,《外国文学研究》对我也越来越重要。

我接触到的第一份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期刊应该就是《外国文学研究》了,该刊创刊的1978年9月,我正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1977年年底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那时还叫华中师范学院,但实际上我们是1978年2月入学的。我们在京山分院呆了半年,9月回到本部,适逢《外国文学研究》创刊。这在中文系算是一件大事,我们所有同学几乎都知道这件事,也有部分同学购买了创刊号。我也买了刊物,并订阅了几年。这些

刊物有一部分还收藏于我青岛的家中。记得主编是徐迟,徐迟在1978年刚刚发表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妇孺皆知,引导了那个时代的风气。我们在这里学习,也算是可以得风气之先吧。《外国文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界最早创办的学术性刊物,通过阅读和浏览杂志上的文章,我也约略知道一点什么是外国文学研究了。我日后走上外国文学研究之路,与早年的这种特殊的渊源不无关系。学术刊物仿佛就像一个个性鲜明的集体老师,它以不发声的方式说话,以不授课的方式教学,以不设问的方式回答问题,并以不求回报的方式默默支持着每一位坚持学术志向与创新的学者。或者说,我与《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共同成长,并在成长发展的道路上互为见证。

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部分老师就在编辑部工作,譬如王忠祥、周乐群、彭端智等。当时给我们上外国文学史课程的老师是莫自佳和宋寅展。王忠祥老师给我们开设过“莎士比亚研究”。记得周乐群和彭端智老师是给78级上课的,我

去蹭过课。将近40年过去了,各位老师上课时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大约在上大三的时候,我对外国文学研究就已经有点兴趣了,并且开始谋划报考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扮男装问题和现象,指导老师就是王忠祥。

我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1991年第4期,题目是《哲学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哲学——论存在主义文学》。该文是我早年发表的较为重要的文章,可以说大体奠定了我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以哲学化的方式研读文学,以文学化的方式研习哲学。循此路径,我开始了自己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以后又陆续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更加坚定了我在学术研究路径和方向。

《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也作出了非凡的贡献。1980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紫葳的《寓严肃于荒诞之中——读卡夫卡的〈变形记〉》,随后1980年第3期又发表了黎奇



徐迟

的《卡夫卡初探》。我对于卡夫卡最初的一点零星的了解和认知,应该就来源于此。顺便检索了一下,《外国文学研究》历年来发表有关卡夫卡文章共18篇,这些文章当然也是中国卡夫卡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40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阅读方式与写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研究的变化自然也不可避免。新形势下中国外国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问题,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可以从中国走向世界,亦可以从世界回到中国。总之,希望《外国文学研究》顺利走过“不惑之年”,进入“知天命”,并继而“从心所欲”,大展宏图,再创辉煌。



作者在穆旦雕像前留影

诗歌翻译是心灵的决斗——谈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

■谷羽

处,一是对照俄语原作读他的译诗,二是挑选普希金的作品,对比阅读不同译者的译本。

查先生高度重视诗歌翻译的音乐性,重视译诗的透明度,尽力在译作中接近或再现普希金原作的节奏和音韵。他擅长挖掘母语的韧性和潜力,筛选最恰当的词语,灵活安排诗行,译笔大胆而灵动,再加上反复修改,推敲琢磨。因而他的译作与众不同,独具特色,最富有激情和诗的韵味,加上他的诗人气质,对诗的深刻理解,这是其译作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

王志耕教授就查译《我耗尽了》自己的愿望……》这首诗对比了五个译本,就一个词запоздавший(迟到的、最后的)具体分析几个译本的得失成败。他说,查良铮使用“弥留的”这个词,让他内心感受到震撼。我在这里愿意补充几个例子。《致恰达耶夫》是普希金政论诗的代表作,查先生的译稿有这样几行:

朋友啊!趁我们为自由沸腾,
趁这颗正直的心还在蓬勃,
让我们倾注这整个心灵,
以它美丽的火焰献给祖国!

查先生把 живы(生存,活着)译为“蓬勃”,大胆而富有创意。“蓬勃”一词音节响亮,且是上声,与“祖

国”押韵十分谐调。把最重要、最响亮的词放在韵脚的位置,取得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再加上“沸腾”“倾注”“火焰”几个经过精心挑选的词汇,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与活力,跃动着爱国青年血气方刚的献身精神。其他七八个译本,全都达不到这样的精神高度。

普希金有一首诗题为《战争》,这里引用查先生译稿的四行:

那狂暴的义勇军的攻击,
军营的警号,刀剑的轰鸣,
还有杀气腾腾的战火里
将领和部卒的壮烈牺牲!……

“杀气腾腾的战火里”原文是“в раковом огне сражений”。俄语形容词раковой,词典上给出的词义是“命中注定不祥的,劫运所致的;非常不幸的,引起祸患的”等等,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杀气腾腾”来得确切,给人印象深刻,让人惊心动魄。文学翻译家离不开词典,但出色的诗句绝不是靠词典能查得出来的,那是译者的再创造。或许查先生在潜意识里,仍难以忘怀九死一生的野人山战役。像这样的诗句,绝对是译坛的杰作,融入了诗人和译者的心血与生命,是他们共同孕育的艺术结晶。

查先生不仅善于表达战争场面

的惨烈悲壮,在传达细腻柔情方面,也有不少出神入化的妙笔。1928年普希金为奥列宁娜写了一首八行短诗表达自己的倾慕。下面引用查译的两行:

有小小的玉足款步来去,
金色的发波也随风飘扬。

对比其他译本,有人把“маленькая ножка”直译为“小脚”,难免让读者想到中国古代女人的小脚,有人译成“莲步”,更加重了“三寸金莲”的联想,都不恰当。查先生译为“玉足”,前面加上“小小的”三个字给予修饰,后面加上“款步来去”四个字进行烘托,生动地再现了美女奥列宁娜的妩媚身姿与步态,同时也把诗人普希金酷爱纤足女子的癖好,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人普希金热爱秋天,在题为《秋》的组诗中,有个不同凡响的比喻,说秋天像患了肺结核的姑娘,查先生的译文片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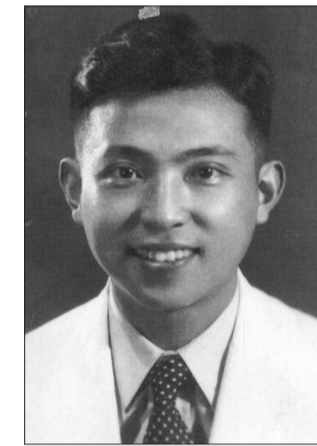
……她就要死了,
可怜的人儿没有怨尤,没有怒气,
……

墓门已经张开,她却不在意:
她的两颊仍旧泛着鲜红的红潮,
今天她还活着——明天呢,香消玉殒。

把“играет”(游戏、玩耍)译为“泛着”,“багровый цвет”(血红色)译为“鲜艳的红潮”都颇见功力。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行的“завтра нет”(明天就没了)译为“明天呢,香消玉殒”,真是神来之笔!“нет”(不,不再)是个司空见惯再普通不过的口语词。查先生却选了一个十分优雅,又颇具感伤色彩的书面语“香消玉殒”与之对应,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艺术效果,堪称译诗经典范例,会心者自然拍案称奇。

细读查良铮先生的译诗,受益良多。我个人认为,诗歌翻译存在对、好、妙、绝四个层次。译得对,译得正确无误,应当是起码的要求,对中对好,好中求妙,是有出息的译诗家不懈的追求,但真正能译到绝妙境界的毕竟是少数。气质、禀赋与原诗大体相当者才能达于化境,这样的译诗才堪称真正的艺术精品。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并非篇篇都属精品,但是有些诗篇的确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

巴尔蒙特(1867—1942)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对于诗歌翻译有精辟而深刻的见解。他曾经说过:“诗歌翻译——是心灵的和谐共鸣,又是心灵的决斗,是两个人的较量,两个人的赛跑,殊途同归,有共同目标。”



穆旦

查良铮先生翻译普希金抒情诗,堪称译者与诗人的心灵和谐共鸣,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高手过招,华山论剑,难分胜负。卓越的译者遇见天才的诗人,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佳话。

我自己写过一首诗《相遇》,愿引用在这里表达个人对查良铮先生的缅怀与敬佩:

当普希金遇见查良铮
弗罗斯特遇见曹明伦
跨越时空和民族疆界
诗人遇见了知音

这是俄语的幸运
这是英语的幸运
这是汉语的幸运
这是诗歌的幸运

诗人寻找译者
译者寻找诗人
诗人和他的知音
在诗的王国内永恒

图书推荐

《上帝怀中的羔羊》与《乱世佳人》的不解之缘

■春眼秋手

提到美国的南方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荣获普利策文学奖的《乱世佳人》(又名《飘》)了。黑猫般的斯嘉丽,狐狸般的白瑞德,白鸽般的梅兰妮。以及蓬裙飞舞的庄园舞会,狼烟四起的南北战争,愈求愈求的锥心爱情,愈战愈勇的女性觉醒。但其实,这部惊世之作的出现,却得益于另一部作品的引荐。那就是南方文学的启蒙之作——同样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上帝怀中的羔羊》。

《上帝怀中的羔羊》作者凯洛琳·米勒(Caroline Miller, 1904—1992)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维克斯市,后随同作英语文学教授的丈夫移居巴克斯利。据说她当时跟孩子们一起短途旅行,途中注意到一些居住在老屋

里的老人,会讲很多早期的故事,令她萌发了筹划一部小说的想法。她的父系和母系家族均扎根于韦克斯,外曾祖父在美国开拓时期长期生活在边地。她开始花时间在家人和周边乡村收集这些边地生活资料,经常以购买黄油和鸡蛋为由接近那些会讲故事的老人。

取材于这些珍贵资料的《上帝怀中的羔羊》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评论界和大众的强烈关注,先后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和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并掀起一股南方文学热潮!爱好者中也包括麦克米兰的编辑罗德·拉萨姆,在读过这部作品后,他把目光投向南方文学,并成功挖掘出版了《飘》。而《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也非常喜欢这本书,盛赞

其为“最伟大的南方文学,亦是我最爱的”。

《上帝怀中的羔羊》出版之前,关于内战前南方农民的生活资料其实非常稀少。因为贫穷白人绝大多数都疲于奔命没什么业余时间,且没受过教育,几乎没有日记或信件留存。史学家也只能通过人口、农作物产量、教会成员身份或政治参与度等数据来揣测当时的状况。所以此书可以说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媒体一致认为,米勒能以散文般优美的语言和史诗般磅礴的气势极为忠实地重现内战前一个与世隔绝的边地村落里,男男女女的生活现状,还原开拓者们于大自然中的渺小和内心世界的强大,得益于米勒做的大量调查和采访,另外还得益于她具有捕捉普通百姓声音,然

后运用于文学语言的天赋。米勒似乎了解笔下人物的生活环境。她能看清他们的生活细节,包括饮食家居、婚丧嫁娶、种植收获。她更了解他们的内心和想法。她的许多描述都与之后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比如主人公希恩虽然同情黑奴,但实际上并不反对奴隶制度,他跟南方那些贫穷白人一样,既憎恶又渴望富裕白人奢华的生活。经常幻想有个黑人帮丈夫干活多好。他的丈夫伦祖也曾经幻想过要有一个黑人女仆,虽然“女仆”这个词让他害羞,但他更希望有人能减轻妻子繁重的劳作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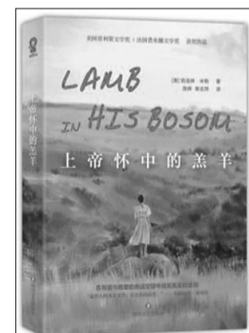
比如希恩喜欢擦得锃亮的时钟,憧憬现代文明,惊叹于时钟能有规律地显示生命的每分每

秒,但同时希恩也依然遵循怀孕、生子、农作物的生长和季节更替等更为古老的自然规律。

比如希恩的母亲西恩回忆她父母的故乡,那里有种叫“苹果”的水果,但她从未亲眼见过。这似乎暗示着他们眼下生活的土地不是拥有苹果的伊甸园,但他们依然留了下来,在此地安家。并且深深爱上这片没有苹果的土地。

从获奖之日起,《上帝怀中的羔羊》便被公认为南方文学经典范本。可以说它补充了《乱世佳人》中缺失的那个阶层。两本书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南方风貌。

另外本书一大看点就是对拓荒者生存技能的详实记录。展现极有规律地显示生命的每分每



《上帝怀中的羔羊》, [美]凯洛琳·米勒著,黎志萍、陈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定价39.80元

秒,从四季更迭和生命循环中学会驾驭自然的能力。在空地上建设家园,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整部小说就像一部关于荒野求生的百科全书,哪怕强悍如斯嘉丽,当年也不过种种地而已,其他根本望尘莫及,更别说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了。建设家园这种能力,我们恐怕是丧失殆尽了。只能去下载个经营类游戏实现庄园梦了。